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五年第四期 总第10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01 中国崛起下一阶段面临的陷阱

聚焦中三角

05 湖北武汉园博园变废为绿 建内地最大海绵公园年省水费近 150 万

06 “湖南矸谷”长沙高新区：智慧智造中心 创新创业摇篮

改革探索

10 部分区域将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11 中国国企改革的虚与实 前景尚不明朗

12 中国反腐与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广角

14 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八大因素

17 宁波跨境电商领跑全国 携港合作共拓全球贸易

科教文卫

19 文化+：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25 电影产业成丝路沿线国家合作新热点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27 中国不应贸然实施大规模土壤治理

社会观察

29 透过生态城看中国城建弊病

综合治理

33 《网络安全法》推进依法治国新举措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35 响应全球“再工业化”推高端制造 香港科技园助香港经济多元发展

学术前沿

38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谈起

老威图书馆

中国崛起下一阶段面临的陷阱

薛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10月8日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经济上允许乃至支持其商业活动（吉利收购沃尔沃是典型例子）；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一些知识精英获得机会从政或者给政府出谋划策，而且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第一，普遍的不满意。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并不少见的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

第二，普遍的不安全感。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上述两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需要治疗。许多人会觉得，这些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可是，有的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并不大，有的则根本无关。

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首先是环境污染，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有些地方依然持发展优先的理念，但已经有些地方宁愿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些牺牲，也要治理环境；有的地方虽然比较落后，也注意选择污染少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治理污染、恢复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较昂贵。这适用于“通过发展来解决”范畴。

第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经济方面，整体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股市依然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近期的典型例子是前一阵子的暴力救市。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不但效果并不好，还成为海外质疑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有力证据。好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调整应对，新的应对很可能更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虽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贡献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限制与歧视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许多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业进入。公有制企业比重过大、效率低下、却受到特别关照（垄断地位、特殊补贴）的状况依然不少见，这既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也导致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逆向流动。政治方面，各级地方领导人对于所管辖区域整体影响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领导人一换，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官员体系也出现大调整。地方债务的增长在本地缺乏制约机制是另一个大问题，按照欧美标准衡量，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第三，缺乏官方与民间都普遍信仰并切实体现在行动中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或者说一套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金钱拜物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示，一个典型例证是，在神州大地的各个寺庙道观，民众大把投钱捐赠之外，还习惯于用投硬币来表达自己的各种宗教与非宗教诉求。于是，成堆的硬币在神龟背上、放生池中、佛像脚下，散发出闪闪的光芒，似乎在践行“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神仙也是可以收买的”等俗语。在商品经济的一定阶段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种现象折射的是民众宗教信仰的缺乏与金钱拜物教的统治，外加中国人实用心理的作用。

从文化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从经济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影响族群的经济行为方式，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对此有很

典型的展示。从政治角度看，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来源，对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存在与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也可以说很困难。但中国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达成了共识，就有解决的可能。

第四，分裂势力。这与第三个有关但不完全一样。中国的分裂势力包括两部分：大陆的分裂势力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大陆方面以“疆独”与“藏独”为代表。香港的分裂势力，虽然是新现象，也难以成气候，但依然值得注意，中央政府应探索治本之道。关于“藏独”，或有必要抓紧时间与达赖喇嘛谈判，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毕竟他与中国政府有几十年打交道的历史，互相比较了解，其主张比年轻一代要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关于“疆独”，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对于露头的“疆独”势力与行为，坚决打击；开展群防群治，把“疆独”势力消灭在苗头状态；强化边防管控，防止“疆独”势力非法越境，但采取措施便利普通民众正常的出入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弱化“三股势力”滋生的经济土壤，包括内地对口支援、设立经济特区、扶持民众的生产与经商、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等等；发展教育，提升民众的谋生技能与对“三股势力”的识别、抵御能力。

上述措施对于防范与打击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要让基层注意，在打击“三股势力”时，避免给普通民众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不便。其他省份在打击“三股势力”时，也应避免给新疆民众的经商、旅游等造成不便。

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三股势力”有向外省、境外发展的趋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地方，既有北京、广州、沈阳、昆明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温州等中小城市。一些分裂势力在东南亚国家出现，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股势力”越境参加训练后回到国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例在增加。很显然，不大可能做到各个省份都采取新疆那样的防范与打击措施，境外更是如此。这些暴恐行为的“根”，大部分还是在新疆。所以，如何采取治本措施，是新疆与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里不展开论述但值得高度注意的是，“三股势力”中暴力恐怖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因为他们所制造的一些事件而对媒体等影响比较大，但是，真正危及新疆长远稳定与发展的却是宗教极端势力：侵蚀维吾尔人的民族文化、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世界观、还试图削弱地方政权。

“台独”无疑是一个挑战。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接替马英九的很可能是蔡英文。她的精神导师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属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人物。李登辉1999年提出“特殊两国论”，她这个“国安会”与“国统会”的委员谋划有功。陈水扁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作为“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有知识、有韬略的人，在信仰并推行“台独”上，她将展示什么叫“不让须眉”。不能因为她的一些竞选言论而轻信其政治主张发生了改变。她如果上台，很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推进“法理台独”。如果大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成为她推进“法理台独”的一个机会。从而触及大陆的底线。一旦大陆因而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与日本将会分别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而涉入。战争范围的扩大将严重打击中国外贸，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五，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已经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一定时候转为低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都属于正常现象。而一旦出现，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苏联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财丰厚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与合法化，这种“国家不幸个人幸”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将成为国家稳定的负能量，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

现在的市场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如证券、期货、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使得经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前。这一点对于经济陷入麻烦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对于经济增长、GDP等也不能看得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算出，中国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见，只要社会稳定、政府与民众一心谋发展，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1990年中国GDP是俄罗斯68.61%，1995年俄罗斯的GDP却变成了中国的54.77%，1999年则下降到中国的18.07%，2014也只是中国的19.81%。这说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后果，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6.2%左右。但这只是一种看法。如果并非如此，而是开始走向通常的经济波谷期呢？该如何应对？这对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难题。

第六，外部威胁，主要是美国。西化中国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把中

国拉入现有的世界体系是中期目标，也是一种西化手段。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形势良好时，并不把西化中国列为近期目标，而是努力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但在中国陷入麻烦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调整政策目标。当中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大陆分裂势力膨胀、台湾推行“法理台独”、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西化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等，将成为美国的现实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是“接触为主防范为辅”。但是，2010年左右转为“两手并重”，2014年以来，有变成“防范为主接触为辅”的势头。南海问题则成为美国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试金石。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从“不持立场”转向“持有立场”，从“间接介入为主”转向“直接介入为主”，从“当导演”变成“既导演又当主演”。但南海不大可能成为美国西化中国的扳机点与主要抓手。美国采取上述行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就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而是旨在“通过平衡中国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保持地区形势稳定、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南海政策目标有比较清晰的判断，因而难以接受中国采取“模糊政策”。但是，南海不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大可能因此而与中国打一场战争。中美双方都没有在南海打一场战争的计划。南海争端处于各方有效管控之下。中国也在调整自己的南海政策，以便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美双方需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沟通以便达成更多的共识，避免误判。

总之，中国如果能成功应对上述六大挑战，就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而会继续发展，直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复兴的指标。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有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路上的陷阱。

聚集中三角

湖北武汉园博园变废为绿 建内地最大海绵公园年省水费近150万

何芯 香港《文汇报》2015年9月29日

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简称园博园）于9月25日在湖北武汉开幕。本届园博园选址在昔日大汉口防洪百年老堤张公堤以及周边的金口垃圾填埋场上，历时3年“变废为绿”，打造成了内地最大的海绵公园，劣五类水体经过园区水

循环系统处理后可将水质提升至三类，全园蓄水可达 10 万吨。“海绵园区”收集的雨水，每年可节省水费近 150 万元（人民币）。

所谓海绵公园，就是在公园改造工程中运用、打造出一批能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海绵体”。由于公园绿地面积比例大，园林地形丰富，天然的渗透力很强，成为最有效的“绿色海绵”。据悉，本届园区内有 82 个国内城市（含港澳台地区）、10 个国外城市、4 位国际风景园林大师、12 家企业等参建的 117 个展园，以及长江文明馆、国际园林艺术馆等主展馆，通过园林艺术建筑讲述各地城市文化与故事。

从 2 公里外金银湖水系引入劣五类水，利用荆山楚水、一湖四溪、雨水花园等景观，构建园区水循环系统，其间不但形成“高山流水”景观，还可供应全园绿化浇灌。园区内除了绿道、广场、停车场全部选用透水砖，让地面“透气”、“透水”，园区内长江文明馆、国际园林艺术馆两大主题场馆也设置屋顶花园，建成内地最大的雨水存储系统。武汉园林建筑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李良钰称，“海绵园区”收集的雨水，基本能实现园区 176 公顷绿地面积灌溉自给自足。

昔日垃圾场“脱毒”变宝

武汉市曾在两届园博园申办中铩羽而归，第三次申办，武汉市将园博园的选址定在了昔日防洪功能衰落已阻碍汉口发展的张公堤，以及生态环境最糟糕的金口垃圾场，方案终于赢得了专家的倾心。

垃圾处理专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称，为将垃圾场中毒污染的土地“脱毒”，工作人员用管道将土地中的二氧化碳气体抽出，后激活垃圾中的微再生物，将垃圾体变为好养状态加速其降解，再进行无害化处理。园博园区北部占地 700 余亩的金口生活垃圾填埋场，如今已是座座园区交错，绿树青水环绕。

“湖南矽谷”长沙高新区：智慧智造中心 创新创业摇篮

李青霞 香港《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

每秒卖 26 张面膜、30 天建成一栋别墅、用机器打印立体模型……在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长沙高新区）每天都在上演“智慧”、“智造”带来的奇迹。

被称为“湖南矽谷”的长沙高新区，以每年新增注册企业 1000 余家，以高新技术企业占长沙市 60%的份额，以创新能力排全国高新区十强的位次，雄踞湖南高新产业一

方，在举国高呼“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之时，长沙高新区已然成为创新创业的宝地。

远大住工麓谷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车间紧锣密鼓的生产 PC 板(预制混凝土钢筋构件)；湖南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游戏开发者们，正在电脑前编写炫目的游戏；一批批有志青年正在这片创业天地中想点子寻方法探未来……

在长沙高新区，远大住工创造了 30 天建成一栋别墅的工业化住宅奇迹；御泥坊创造了每秒卖 26 张面膜的电商奇迹，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在这里谱写传奇。

翻开长沙高新区 2014 年的成绩单，不能不为之硕果累累而惊叹。2014 年，除工程机械外的其他产业产值增速均超过 20%，高新区获批全国首家环境服务业试点园区，节能环保产业实现收入 200 亿元，增长 30%；获批全省首个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增长翻了一番、收入突破 100 亿元；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长 31%，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增长 25%。

成本优势促投资热潮

去年 9 月 15 日入驻长沙市高新区的湖南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入驻的短短 10 个月时间内，客户新增量就达到了 60 余万。公司副总经理谢锋告诉记者，“公司从 2012 年开始转向移动互联网产品的转型，这两三年我们的客户数增加了 400 万家。”

放弃同期考察的重庆、厦门、武汉，而选择落子长沙高新区，谢锋表示，高新产业聚集形成的行业效应，中部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高校人才汇聚的人力优势，政策土地构成的成本优势等是促成“我们来了的原因”。

“回家创业吧！”是长沙高新区喊出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湘人品性和浓厚绵长的乡情，也会成为在外兴业的湖南人回乡创业的动因。湖南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中清龙图）CEO 刘新宇就是带着这份“我是湖南人”的乡情来到了长沙高新区。

当然，商人除了乡情更看重的是“这里能给我带来什么”。刘新宇说，“我们在长沙设立研发中心，效果还是不错的，比我想像的要好。”企业注册的绿色通道，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大力的补贴扶持，以及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交通区位等，使得去年 2 月才成立的湖南中清龙图，仅发展 1 年多，就从刚开始的十余人发展到现在的 200 余人。

加快形成“十亿企业”

与此同时，新加坡丰树集团投资逾 10 亿元，在高新区建设长沙现代服务产业园；

中兴通讯在中部地区最大的全球性研发及生产基地落户高新区；中光通信、康奕达、金瑞新材、长城信息等企业也纷纷入驻高新区。

高新区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中国顶级的“智慧”、“智造”企业吸入，并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智慧”、“智造”磁场。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社辉表示，高新区今年将力争新增移动互联网企业 600 家，实现 300 亿元以上的营业收入。

“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以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为主的 4 个‘千亿级集群’，以电力智慧控制与设备、生物医药、先进电池及材料、光伏新能源、专用车及汽车装备为主的 5 个‘超百亿级产业’，大力培育和扶持 60 家以上技术水平高、产业带动力强和财税贡献率大的行业领军型企业实现总收入过 10 亿元，加快形成‘十亿企业’方阵。”罗社辉如是说。

年轻创业者：打造自己的“帝国”

年轻的朝气、创业的激情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小小霸气，是他们共同的特质。走进高新区，走进他们的创业天地，总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股十足的干劲儿和拼劲儿。

11 年的创业经历，早已磨去稚嫩的外表，取而代之的是沉稳、成熟。湖南泰圣思网络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展在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时，提及过程中的失败、煎熬和痛苦，早已云淡风轻，但听者仍为之一震，创业之路确实不易。

在大学期间就不断“折腾”，在日本工作后也未消停。一直“不安”于给人打工的刘展在日本工作 4 年后，敏锐发现了软件离岸外包的广阔市场。随即回国，在北京注册泰圣思信息系统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泰圣思”）。

2005 年，26 岁的刘展，带着在日本打拼积攒的 50 万元，正式归国，开始潜心经营泰圣思。但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海归”的水土不服，刘展在创业初期遭遇了“滑铁卢”。不久后，刘展又在日本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征程，但“时不与我”，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泰圣思再度陷入危境。“那时我的心几度跌入冰点，好几次想放弃。”回忆往昔，刘展对当时的心境仍刻骨铭心。

失败带来了伤痛但也带来了经验。刘展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创新的重要性，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他萌生了“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移动动漫游戏帝国”的想法，之后他在福州、泰州等地都成立了公司，开始一步步扩展自己的版图。

作为湖南人的刘展，乡情亦浓，他说，“将泰圣思的版图扩展到湖南，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去年 7 月，湖南泰圣思网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目前，长沙公司招聘的技术骨干大部分都在北京学习，计划三个月内将北京公司的技术架构和开发引擎

带回湖南。”刘展说，他的移动动漫游戏帝国梦想正逐渐变为现实。

享受创造过程很重要

在高新区如刘展这样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数不胜数。80后的曾敏是湖南炫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从创业初期的毛坯房办公，到现在出入宽敞明亮的写字楼，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到现在的数十人，他用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曾敏说，“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无法预料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学会享受创造的过程很重要。”

因上海、北京的朋友陆续到（高新区）麓谷创业，自己也有了回乡创业念头的欧阳松，已经成为长沙高新区创业大军中的一个。2014年，乘着长沙着重培养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浪潮，欧阳松在高新区成立了一家专注于远程医疗服务的公司——长沙有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市场广阔，公司发展态势非常好。

在长沙高新区，每栋写字楼中几乎都正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创业故事，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苦干，希望创造更大的天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帝国。

移动互联网创业可获 20 万资助

“每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都有望获得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6月29日，长沙高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移动互联网“柳枝行动”正式启动。高新区为决心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舞台，更为他们创业提供了最根本的资金支持。

“柳枝行动”是连续三年，每年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从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共 4000 万元专项资金，以无偿资助方式给予进入高新区芯城科技园和软件园的每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高新区将提供不少于 5000 平方米免费创业办公场地，并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移动互联网创业型企业和团队提供办公环境、公共技术服务、财税法律服务等。

“你需要的高新区这边基本都能提供，你只需要把创意做好，把工作做好。”对高新区有如此高评价的这位，就是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归国的创业者陈邦道博士，他对未来在这里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部分区域将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香港《文汇报》2015年9月8日

据悉，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对外发布。

按照方案，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成为改革试验区域，担负起先行先试的重任。

这次改革试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方案给出明确答案：

——探索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有效机制。要构建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推进要素价格倒逼创新，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

——探索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要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速促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产业化，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探索激发创新者动力和活力的有效举措。要让创新人才获利，让创新企业家获利，强化对创新人才的激励，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探索深化开放创新的有效模式。要开展更高层次的国际创新合作，推进科技计划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技术和国内品牌走出去，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中央党校教授赵振华表示，此时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在结构调整中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实现科技创新，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培育一大批新兴产业。没有科技进步和创新就谈不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赵振华说，“这需要形成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等协同创新的机制，特别是通过市场机制把几个方面连接起来。”

根据方案，这次试验区域的选择很具有代表性。京津冀是跨省级行政区域，还有4个省级行政区域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

方案指出，这样做有利于结合区域发展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长三角核心区域率先创新转型、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促进产业承东启西转移和调整、加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方案提出了改革试验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今年各试验地区要拿出改革试验方案，明年全面推进落实各项改革部署，2017年后将开展中期评估

并适时推广重大改革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表示，在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意义重大，各相关地方一方面要有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确保改革试验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中国国企改革的虚与实 前景尚不明朗

日本 日经中文网 2015年10月11日

中国政府开始着手重组国有企业。负责掌管央企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跨国公司”作为目标，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不过，没有裁员的重组反而存在拖延产业结构改革的危险，重组成败尚不明朗。

针对2012年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大型锻压机厂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发布消息表示可能无法支付26日的公司债利息。该企业是国资委完全控股的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但业绩显著恶化，资金周转困难。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国企加紧重组，一方面为提高国企国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像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一样陷入部分经营危机的企业。

国企在中国股市的评价较低。由沪深两市的国企上市公司构成的中证国有企业综合指数自2009年6月底开始发布以来，上涨率停滞在18%。而由民企构成的中证民营企业综合指数的上涨率则超过2倍。

许多国企在管制下通过垄断获利，缺乏技术创新等对未来增长的预期，造成国企股价低迷。

实际上现在提出的国企改革和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时实施的国企改革有很大不同。朱镕基将原铁道部下属的车辆厂商拆分为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这虽有一定局限但却推动了国企民营化，促进了国内竞争。朱镕基改革虽然使超过4000万国企职工下岗，却赢得国际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现在则把象征朱镕基改革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进行了合并。9月13日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出售政府所持股份使国企走向完全民营化持消极态度。如果重组加强了国内垄断，相反将可能使低效经营温存。

习近平领导层的这一改革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目前还无法定论。国企之一的武汉钢铁集团从9月8日起，开始将本公司45名32~52岁的焊工和车工派往武汉市化学工业区作为“协警”担任保安工作，但工资和武汉钢铁集团的员工身份没有变化。武汉钢铁集团表示这是因为低收益的钢铁业产生了不少剩余劳动力。

武汉钢铁集团和同样属国企的宝钢集团及鞍钢集团的重组方案已经浮出水面。当年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时，街上满是下岗人员。而习近平领导层保障就业的姿态非常明确，国企也对裁员含糊不清。

中国国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110家由国资委持股的“央企”，另一类是地方政府持股的“地方国有企业”，仅工业领域全国就有约1万8000家。中央政府也不能随意干涉地方国企的经营和人事安排。

此次“指导意见”仅以央企为对象，不包括地方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可能影响就业和税收的重整非常消极。今后，国企问题似乎无疑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负担。

中国反腐与经济体制改革

邹至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10月9日

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但是国内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世界新闻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的政策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施行最重要的政策，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的重要。本文先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贪污。再提出一些建议来减少贪污。这些建议同时也是适应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贪污现象是大家共识的，清除贪污有两种办法。一是严重处罚犯贪污的人。这是今天施行清除贪污的办法。加以严重处罚会降低贪污的利益。二是消除犯贪污的机会。犯贪污必须有贪污的机会，从贪污拿到利益。消除犯贪污的机会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犯贪污的人必需有机会从他的职务得到利益。有两种职务可赋予经济的利益。第一是有权力批准经济活动。第二是有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第一种的经济活动包括创办私营企业，施行私营企业需要进行的的活动，如领取出口或进口证书，个人需要政府批准的各种活动，如领取各种证书。第二种的权力包括管理国营企业或银行的领导拥有的权力，可以用来分配经济资源，把国有资源归为己有。用第一种权力拿取利

益便是贪污。用第二种权力拿取公有资源也是贪污。要利用消除犯贪污的机会来清除贪污，便要把上面说的两种权力消除。消除犯贪污活动的权力，贪污的活动便不会发生。

取消作贪污活动的权力包括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小国营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第一点是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力。第二点是增加私营企业和银行的建立。一个管理国营企业的干部把企业的财富归为己有便是贪污。一个私营企业的业主或管理人拿去企业的资源不是贪污。业主当然有权拿取企业的财富。如果企业的经理不合法地拿去企业的资源，是犯法行为，不是贪污。他不是政府的官员或国营企业的管理人。他的非法行为由企业的业主根据法律处分。

上面所谈两点，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少国营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正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容许政府参与大量的经济活动，如控制大多数的企业，让国营企业的生产占全国总生产很大的百分比，正如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缩小国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增强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这也是一个清除贪污的办法。

中国的贪污比其他国家严重，原因是中国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建立。美国贪污的程度比中国小，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比中国的完善。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很难找到像中国今天贪污的盛行，因为中国从前没有施行计划经济。中国历史，尤其是在汉，唐和宋朝，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当时政府的活动范围小，国家的生产多半由私营企业担负。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值得鼓舞的。

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问题是建立公平的社会与增加经济的效率。贪污是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贪污官员拿去人民财富是不公平的。体制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增加经济效率。本文说明如何用经济的手段来辅助现行的行政手段来清除贪污。同时我们可以考虑用行政的手段来促进市场经济改革。很多有权力的人控制国营企业的运作和指定银行贷款给国营企业。这些行动阻挠市场经济改革，政府应当用行政手段处罚。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配合，同时进行清除贪污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益想来会更高。

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八大因素

李佐军 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9月17日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处于下行阶段，但同时结构也在优化。从经济下行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换挡期。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的，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而且经济增速还在换挡。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的高度。

其实，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进入下滑期是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的。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

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下滑持续了5年时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应该从2007年算起，因为当年GDP增速最高达时到了14.2%，随后因为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影响，GDP增速开始下滑。如果从2007年算起，那这次下滑时间就持续了8年。如果按2007年的增速峰值算，这8年的下降幅度超过了50%。即便是按2010年的12.1%计算，5年间的下降幅度也有40%多。

“三驾马车”日渐式微

那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经济下行时间这么长，下降幅度还这么大呢？

更为严重的是，此次经济下行还没有探底，还存在持续下行的压力。这些因素可以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来分析，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来分析，从供应边因素和需求边因素来分析，也可以从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来分析。

理论上说，从长、短期因素来分析更为合理些。一般来说，需求边因素大多是短期因素，供应边因素是长期因素。短期因素就是指“三驾马车”，而很多人对“三驾马车”存在认识误区，以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只有“三驾马车”，外需不行就扩大内省，投资不行就拉动消费。但严格来说，“三驾马车”并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特殊手段，并不是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三驾马车”主要通过投资等经济刺

激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会产生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不妨先来看看“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失去拉动作用的事实。

首先看看出口情况，出口这架“马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20%，甚至30%以上。

但是最近两三年来，这一增长速度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了增长6.1%，2015年前7个月已经下降到了负增长0.8%。也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基本失去。

那投资这驾“马车”呢？投资确实是多年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主要由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部分组成。

但这三方面投资都已经受到了限制。制造业投资受制于产能过剩；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房地产已经进入下行通道，房地产投资也受到影响。所以投资的拉动力也远不如从前。

“三驾马车”的最后一驾“马车”——消费呢？虽然消费增长速度是相对稳定的，而且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还是上升的，但也只是因为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相对下行、消费的贡献率相对上升的结果而已。

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以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滞后的制约，使得消费拉动GDP增长的力量非常有限。

通过“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短期内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副作用开始凸显，而且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

通过经验总结发现，真正能够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应该是健康和可持续的“三大发动机”。它们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

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就是指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和推进信息化等。

“三大发动机”对应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强调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因而是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

重点要解决长期动力

从长期因素来看，导致中国此次经济下滑时间如此之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的因素主要有5个方面。

第一是人口因素。从2011年开始，中国15~64岁的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这意

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拐点，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这将对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造成阻碍。

第二是资源因素。中国这么多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资源消耗越来越多，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因此，若想未来保持同样的增长，或者较高的增长速度，都必须在获取资源上付出更高的成本。

第三是环境因素。当前中国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治理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投入。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作用。在未能处理好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平衡的关系时，负面的、消极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四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因素。从工业化角度来说，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就是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同时也是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阶段。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上半阶段，上半阶段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拉动 GDP 的能力比较强。前两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阶段，下半阶段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的阶段，一般来说这个阶段拉动 GDP 的动力就不如前半阶段。

第五是改革。前文提到“三大发动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度变革，中国一直在试图通过改革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但短期来看，改革是一个过程。目前的改革还遇到了不小阻力。

不可忽视的是，有的改革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有的改革是解决公平问题的，不一定有助于经济增长，甚至还有矛盾。因此，改革的滞后效应、多重目的性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处于下滑期，但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好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消费对 GDP 的贡献比重在提高，2014 年即达到了 51.2%，今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了 60%。这大大超过了投资对 GDP 的贡献。

二是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有所提高。2014 年这一比重达到了 48.2%，2015 年上半年上升到了 49.5%，超过了第二产业所占 GDP 的比重。

三是城镇化率在不断上升。最近几年，我国城镇化率连续每年增加 1 个多百分点。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4.77%。

宁波跨境电商领跑全国 携港合作共拓全球贸易

香港《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

201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批五个跨境电商服务试点城市之一，依托电子口岸建设机制和平台优势，宁波先行先试，扎实深入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项目。2014年度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口业务销售额达3.7亿，列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首，并同时实现四项指标全国第一：经营商品种类最多、发送包裹最多、消费者人数最多、商品货值最高。如今，宁波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望与香港贸易商合作，共拓全球跨境电商贸易。

外贸大市抢占跨境电商先机

宁波是外贸大市，外贸产业关联度达60%以上，拥有2万多家外贸进出口企业，对外贸产业的依存度达到60%以上，是浙江首个、长三角地区第三个外贸总额超千亿美元的城市。据统计，2014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047亿美元。宁波发展跨境电商条件得天独厚。

宁波市政府口岸打私办主任丁海滨表示，相比于全国其它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宁波拥有更多优势：宁波舟山港集团9月底正式成立，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物流便利且成本低；宁波拥有包括宁波保税区、梅山保税港区等在内的一批特殊监管区；宁波企业较早地看到发展跨境电商的巨大商机，纷纷抢先进入这一市场；宁波已成为阿里巴巴天猫国际、美国第二大零售商好市多超市跨境业务的重要基地，集聚了网易电商、顺丰电商等一批重大跨境电商项目，相关企业在甬投资还会进一步加大。

丁海滨指出，宁波在引进知名电商企业入驻时，也重点培育本地的跨境电商企业，如正正、淘淘羊、丫丫趣购等一批宁波本地企业也逐渐做大做强。目前宁波市已形成宁波保税区、栎社机场物流园区、梅山保税港区等特色集聚区为主体，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宁波保税区、梅山保税港区等地建设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平台为辅的多点支撑、多极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宁波还建成了中国塑料城网上市场、世界再生网、大宗商品交易所等优势知名平台。

截止2015年10月，已有463家电商企业签约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口试点业务，其中172家已经通过跨境购平台上线经营，有部分试点电商已经启动新三板挂牌。有来自全国各地（包含港澳台地区）的335万名消费者通过跨境购平台进行了商品购买，交易额18亿元，各项数据均处于各试点城市前列。另外，宁波也是首个同时

开展进出口试点业务的城市，自今年5月底开展实单试运行以来，已有23家企业参与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出口业务，累计货值达10088.33万美金。

甬港合作潜力巨大

香港一直是宁波市重要的经贸伙伴，香港已成为宁波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宁波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桥头堡”。据统计，2014年甬港间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57.1亿元人民币。

首次针对跨境电商领域举办的甬港专题活动，将促进甬港跨境电商及其物流领域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拓宽宁波跨境进口电商货源渠道，扩大售卖商品品类。

丁海滨表示，香港拥有一大批的国际贸易商，香港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于今年年初成立，相关方面也希望与宁波展开交流合作。“香港本地制造的一些商品也可以通过宁波向全国进行推广。”

丁海滨认为，香港贸发局等机构在全球拥有办事处，宁波的企业可以通过他们走出去。此外，在宁波也有部分企业想借跨境电商转型，有些为跨境电商配套服务的企业更是希望通过香港打开更大的市场。“也欢迎香港的企业借宁波这一平台，分享跨境电商这一蛋糕。”

每年2000万扶持资金

为加快推进宁波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宁波市近期将出台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争取到2018年，全市实现跨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指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实现的交易额）100亿美元，其中进口交易额20亿美元，出口交易额80亿美元，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宁波市还计划每年安排市级跨境电子商务扶持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并通过引入股权融资等资本运作方式，用电商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向跨境电子商务集聚，并向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保险支持，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此外，鼓励企业扩大进口商品种类，逐步建立起涵盖母婴产品、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电子产品、轻奢品等品类齐全的商品体系。推动宁波重点行业和优势项目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试点示范。

丁海滨表示，接下来宁波将整合相关仓储资源，以解决仓储资源日益紧张且成本不断上涨的企业发展瓶颈，还将把相关组织机构集中办公为企业提供便利，此外，宁波还将进一步扩大试点，如梅山试点、海关监管条件特批等举措。并加大出口，布局海外市场，未来形成以保税区为中心，多点布局的跨境电商发展格局。

单一窗口促通关便利

宁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于9月正式上线发布，定位为宁波口岸通关贸易综合服务门户平台。该平台不仅服务于宁波及浙江省的进出口企业，而且与多个国家建立合作与互联，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机构和企业，并真正做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丁海滨表示，建立“单一窗口”不仅是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企业通关效率实现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基础。

目前，宁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主要涵盖货物进出口通关、运输工具进出境、跨境电子商务、人员进出境、资质认证备案等各类进出口业务办理，汇集宁波对外贸易招商、会展、政策、物流等各类服务和信息资源，并提供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

与此同时，宁波还搭建了一个电商企业展示及企业与监管部门信息对接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跨境购，构建了一套商品防伪溯源正品保障体系，所有商品从海关跨境监管仓库发货，都贴有唯一防伪溯源二维码，为消费者提供“阳光海淘”。

科教文卫

文化+：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香港《经济导报》2015年8月24日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但在经济新常态、信息技术革命、市场需求井喷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多重背景构成的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亟待实现新的突破，“文化+”是新形势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与现实依据

“文化+”，是以文化为主体或核心元素的一种跨业态的融合，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将文化创新创意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形成以文化为内生驱动力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与新形态。“文化+”的实质，是要实现内容、市场、资本和技术等关键要素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聚集、互动、融合和创新。

历史上的文化发展中没有明晰的“文化+”概念，但“文化+”从来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造纸术、印刷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极大推动。中国人在汉代所发明的造纸术，不仅使大量纸张替代了原来的简帛，改进了文字书写工具，而且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一种新的信息交流媒介——印刷书应运而生。这两大发明极大地降低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成本，扩大和便利了知识教育传播的愿望和手段，“文化+技术”由此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对文化发展的驱动更为明显。单就技术层面而言，19世纪以来陆续发明的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照相机、留声机、传真机、录音机、摄像机、复印机、卫星通讯、光纤电缆、计算机、互联网等，标志着人类迈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它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人类信息发布与知识交集，促进了信息产业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依托金融资本和知识集中的资源优势，推动了文化的产业化、全球化进程，使文化产业形成日益发达的局面。

在今天，随着全球生产、贸易、服务、消费体系的迅速形成，包括文化在内的要素资源流动呈现不断加速之势。这种流动体现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某一要素资源内部的流通（如全球资本市场），二是要素资源的跨域流动和相互渗透。在此背景下，各产业门类之间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尤其是随着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流通无不是以综合性、跨业态的形式出现，体现在文化产业上，就是“文化+”发展模式的日渐明晰。“文化+”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动能与活力驱动文化产业的更快发展，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文化产业本身的市场竞争力。美国文化产品之所以风靡全球，固然有美国依托其超强的国家实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因素，但美国本身的科技发展水平、金融创新能力及其与文化创意的高度融合，无疑是美国文化产品极具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芬兰学者汉娜尔·考维恩曾经考察商品与市场中的文化因素。她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但是与文化意义相连的，而且是有意识地相连。一方面，商品中的物质成分在知识的帮助下出售，另一方面，知识的出售又与物质实体相联系（注：林拓、李惠斌、薛晓源《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第1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这是信息社会中的一种常态。

对于我国而言，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尤其是以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为起点和标志，作为新兴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

为3440亿元，2014年已达24017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15%提高到3.77%，年均增速超过20%，10年增长了6倍，远高于同期GDP增速，正在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方向迈进。

我国文化产业之所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其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文化+”跨业态融合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而“文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通过改革传统的文化事业体制，推动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实现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大规模“转企改制”，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并逐步走向市场，不断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颁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门槛条件，推动了民营文化经济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本身不仅使文化市场主体可通过横向的市场资源配置获得新的发展动能与空间，而且促进了文化市场主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与科技、金融等的业态融合，成为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最大内驱力。

以深圳为例，作为一个文化积累相对薄弱的新兴城市，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实现了爆发式的快速发展。2004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仅19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6%，2014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达1553亿元，占GDP的比重提高到9.7%，已成为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并列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10年来，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达23%，不仅形成了创意设计、文化软件、动漫游戏、新媒体及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出版、影视演艺、文化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高端印刷、高端工艺美术十大优势行业，而且充分发挥高科技城市、金融中心城市和滨海旅游城市特色，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形成了“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金融”“文化+互联网”“文化+电商”等产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

深圳是一座以创新科技引领发展的年轻城市，从历史上看缺乏文化积淀，但随着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各种文化要素、生产要素的频繁流动和聚集，从而迅速形成了以“文化+”为特征的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先锋城市。深圳的发展路径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成功探索，也充分揭示了“文化+”将是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向。

“文化+”的战略意义

经过30多年的高速持续增长，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受制于体量、人口、资源、环境、世界经济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产能过剩、经济放缓、结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11月举行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3个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也指出新常态带来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虽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发展态势看，多媒体与电信技术的整合带来文化内容生产、发行和消费手段的一体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行渠道数量增加和销售平台的发展，使人们对文化内容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长，并促进艺术和文化表现新形式的产生。新的通信技术带来不断变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新一代消费者开始使用网络、移动电话、数字媒体等方式，文化体验的范围不断扩大，也将消费者从文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文化内容的积极创造者。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产销者”，即交互式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产销者”的出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经济新常态与技术革命交汇，加上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文化与创意的日益融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呼唤等构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在新形势下，实施“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文化+”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如果说过去10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那么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所激发出的制度红利和文化能量的历史结果。而这种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制度红利和文化能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是成功从传统文化业态过渡到跨业态发展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文化市场合法地位确立的情况下，相比于近10年的爆发式发展，改革开放后20年我国文化产业虽获得了初步发展，但其速度是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只是传统文化业态的单一化发展。其中的突出例子之一是演艺市场，受制于传统文艺体制的制度低效及其路径依赖，我国演艺市场长期以来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萎缩。而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在改革国有文艺院团的

同时，由于放宽了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门槛，民营或跨所有制文艺院团开始崛起，并借助其灵活的投融资机制、高科技的制作方式和创新性的市场营销手段，即通过“文化+”的跨业态发展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和演艺市场的极大拓展。2005年，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有2800多家，到2014年已达8700多家，演出收入从11.4亿元增加至75.7亿元，增长了5.6倍。

由传统业态的单一化到跨业态的多元化发展，“文化+”在影视产业身上同样取得重大成果。在《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等政策文件的指引下，在国有影视制作机构之外，民营甚至外资文化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影视投资与生产领域，多元文化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文化、资本、科技等横向市场资源配置的交叉化、繁复化，推动中国影视产业迎来一个产量、规模意义上的繁荣期。如近年来中国电影总票房逐年攀升，200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仅为26.2亿元，201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到2014年已达296.4亿元，8年增长了10倍多。2015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203.63亿元，预计全年票房将达到415亿元至430亿元。中国电影票房的狂飙突进，是“文化+”实现内容、市场、技术、资本融合的典范。

可见，如果说“文化+”是过去10年文化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原因，那么在未来，从战略高度强调和重视“文化+”跨业态发展模式，将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文化+”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产能过剩、经济放缓、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转型升级压力日益加大。而要有效实现转型升级，通过实施“文化+”战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其中的重要途径。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优化结构、融合性强、可持续的独特优势，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其发展有利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尤其是它具有低碳经济的特点，是受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较小的新兴产业之一，不会随着资源枯竭而萎缩，不仅消耗低、污染小，而且能改变传统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中国尤为重要和迫切。

其次，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生活服务又为生产服务，文化产业更快发展能迅速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抓住调整供给结构的突破口，从总供给方面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正是凭借独特的产业价值链、快速的成长方式及广泛的渗透

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文化产业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也构成我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文化+”不仅铸造了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着整个业态。如果各行各业都有“文化+”，那么我们的生活品质、社会品质、人的素质，都会有很大提高。

最后，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跨界融合特点和能力，其对传统产业文化内涵和品质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新兴产业门类和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如三网融合带动文化产业链上众多行业发展，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运营商及光纤通讯设备制造商都将获益。事实上，文化产业爆发式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文化内容为王的基础上，与科技、金融、商业、旅游等融合发展，这既是文化产业外延扩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提出的迫切要求。

中国的全民医保制度包括：城镇劳动者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后者由城镇非从业居民享受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居民医保）与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整合而成，总共参保人数已达13亿。与职工医保相比，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障的是老人儿童无业人员和农民，他们无疑是更难抵御大病来袭的弱势群体。

这些年来，我们看惯了报纸上、电视上报道的被疾病压倒全家的悲剧，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感叹之余，你我不少人曾经捐过款，为这些家庭尽一点绵薄之力。然而，你我都明白，这世上的苦人何其多，能得到媒体关注报道并获救助的毕竟是少数幸运儿，而更多的低收入人群仍旧苦苦挣扎在治与不治，为自己的生命去做取舍的悬崖上。即便是收入不错的人群，有几家经得住大病折腾？特别是独生子女时代，一对夫妻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两个儿女，一个人生大病就足以倾家荡产，其他的人该怎样继续生活？这不是个别倒霉蛋要面对的问题，每个人，包括你我都难保不会面对。

正因如此，李克强说，通过大病保险给患者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这本身是“善事”，更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器”。“为什么当冲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发生时，会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切？因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未来会不会也遭遇同样的问题。”

3年前，中国建成的全民医保体系，尽管有96%的覆盖率，但保障标准极低，只不过是迈出了最最基本的一步，看病贵，看病难依然难以解决。但不可否认，能够覆盖13亿人的医疗体系仍是惊人的成就。当时全民医保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大病医保，如今，这个短板终于开始补上，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面覆盖使大病保险的第一

年（2015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17年，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这样小步快走的路径给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此次大病医保政策的另一大亮点是对大病的认定。如何才能称为“大病”呢？现行的中国医保制度对“大病”限定了病种，不在医保目录中的大病不算大病。在这次大病医保认定方面，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解释，“我们推行大病保险是按照费用来界定的，这次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我们就认为它达到了‘大病’标准。”这意味着突破了医保目录的限制，让所有疾病都纳入保障范围。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家庭的卫生支出如果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等于或超过40%，即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的文章称，2011年中国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比例为12.9%，即1.73亿中国人因大病陷入困境。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尽管大病医保全覆盖开始推行，仍应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报销比例方面，50%看起来好像不少，但对于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大病来说，依然远远不够。此外，目前的大病保险制度，并没有一个“全国版本”，基本上是各地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的保险标准。医保体制统筹层次比较低，尤其是在面对大病跨地就医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更重要的是，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看起来是提高了大病待遇，实际上并没有新的筹资来源，它是从基本医保里提取资金保大病。通过引入商业保险来提高保障水平。但商业保险是要盈利的，只有在保险公司的盈利与逐步提高医保保障水平间取得艰难的平衡，大病医保才能长期运转下去，而这是一条道阻且长的路。

电影产业成丝路沿线国家合作新热点

澳门《华侨报》2015年9月29日

26日晚在福州闭幕的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是国家“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重点项目，由福州和西安轮办，这两个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以电影工业带动城市营销，是各国很多城市“机智”的选择。在中国，即使稍微后知后觉，在国内电影票房连年高歌猛进、一部真人混搭“小动画”的《捉妖记》就

轻易斩获20亿元(人民币,下同)收益后,加快发展电影工业也渐成共识。

“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已经毫无悬念。”尽管尹力流露出对各地一窝蜂兴起影视文化带动旅游的担忧,但他并不否认其中的正面作用。

有如《罗马假日》带活整个罗马城市,电影确实对地方的关注带来直接效益。尹力说,更重要的是,电影是文化传播、价值观输出的最好媒介,在一带一路的话题下,这是个长期的国际合作构想。

作为本届电影节重要活动,丝绸之路影像城市论坛实现了丝路电影节与釜山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签约缔结姐妹电影节。

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荣誉主席查克·鲍勃称,不仅未来将加大相互选片范围,在资本、技术和创意等方面还将进行深入合作。

逾百名丝路沿线国家电影人及文化主管官员现身本次电影节专设的多场论坛中,梳理各国电影合作现状和前景,探讨如何利用电影产业营销和发展城市。因电影之名,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构想逐步被勾勒出来。

一带一路愿景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巨额资本必将强化关联国的合作,亚洲影像委员会主席吴爽根对此有直观认识。他同时认为,电影节恰是展现各国文化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最好平台。丝路沿线各个国家的众多影像制品,将会促成民众对多样化的作品有共识,也将促进电影产业发展。

对于各国电影合作经常面对的政策、资金壁垒与语言文化背景差异化阻碍,各国电影人并不讳言。俄罗斯资深制片人阿列克谢·阿·彼得鲁欣建议,丝路沿线各国应该打破区域与电影市场的既有观念,成立合拍基金,提供给合拍片团队充裕的资金与协助。此外,乐视影业CEO张昭也提出,各国还应成立联合网络发行机制,让各国观众即使不进影院,也能在网络接触丝路各国电影文化的交流。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好方式就是合拍,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总经理徐淑君说,我们可以借助对方国的发行渠道、营销手段和技术,取得对方市场。

事实上,出席本次电影节的各国电影人大多有备而来。今天我们的合拍电影,已经不仅仅关注技术,而是更关注电影内容本身。波兰导演克里日托夫·扎努西带来一个与中、俄合作的项目,我们要考虑如何以不同国家的民众的思维方式去讲故事。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说,我们期待在未来的中外合拍电影中,能够进一步扩大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合作。

2017年,中国将启动跟美国的电影谈判,进口配额、分账比例都将提高,为此中

国电影做好准备了吗？尽管大有机遇，尹力仍有隐忧，中国的电影产业布局不尽合理，仅靠单一票房收入，延伸产品、版权授权、主题公园等产业链都远未成熟，法规出台，后期人才培养、更合理的产业布局，培育优良的观众资源，都是中国电影要面对的话题。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中国不应贸然实施大规模土壤治理

刘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9月11日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环境网站“中外对话”说，防治土壤污染需要海量资金，但在污染家底不清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治理，有可能沦为环保产业的一场投资盛宴或游戏。中国环保部8月3日发布文章说：“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将出台。今年中央下达重金属专项资金36亿元，支持30个地市重点区域重金属治理和37个重金属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

治理空气、水、土壤污染被称作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三大战役。“大气十条”、“水十条”都已出台，唯有“土十条”还未公布。据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估算，“土十条”发布之后，带来的投资将远高于5.7万亿元。

由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发布的《土地整治蓝皮书》称，中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需要海量资金，并可以直接带动土木工程建筑等70多个行业的发展，间接带动“水泥制造”、“采矿、采石设备制造”等近200个行业的发展。

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外对话，目前中国土壤污染家底不清，贸然投巨资开展大规模治理，治理效果不理想，有可能形成新一轮污染，并成为环保产业的一场投资盛宴或游戏。他说，土壤污染情况不清，包括污染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污染，以及污染程度多大等。“治理土壤污染首先应当充分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以形成社会监督。”

在马军团队推出的污染地图上（目前改名为蔚蓝地图），已经有了大气污染地图、水污染地图，但还没有土壤污染地图，原因是缺乏官方公开的土壤污染数据。

中国2014年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该调查历时8年多，但没有给出准

确的土壤污染数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称，本次调查以点位超标率来描述土壤污染状况，“给出准确的土壤污染面积的数据有较大困难”。

在家底不清的情况下，中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大幕即将拉开。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正在酝酿一系列鼓励政策，促进和规范土壤污染治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逐步将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

土壤污染防治巨资从哪来？中国的环保部门近日也召开研讨会，讨论美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超级基金能否“洋为中用”。

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李静云透露，中国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学习和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的经验。但马军认为，美国超级基金在投资污染治理方面，存在投入产出比不高的情况，中国应当避免。

最新出版的这本《土地整治蓝皮书》佐证了马军的说法。蓝皮书介绍说，美国通过立法批准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20世纪90年代，美国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投资约1000亿美元，但至今仍有50万幅地块需要治理。

边治理边污染可能成为环保产业的投资游戏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告诉中外对话，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超级基金法并不适合中国。“土壤破坏容易治理难，所以污染源头的控制是土壤保护，而不是超级基金强调的治理。”陈能场认为，防治土壤污染需要优先区分出两种类型：未受污染的和受到污染的。首先要搞清楚，哪里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哪里是已经污染的，把没有污染的保护起来，治理已经污染的。

马军也持同样观点，认为防治土壤污染重在防止新的污染产生，“防治土地污染需要有步骤实施。优先做的是把污染数据充分公开出来。土壤污染不像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看不见摸不到，说投入巨资治理好了，但是不是真的治理好了，很难讲。”马军认为，缺乏基本信息的披露，就缺乏社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唯有信息公开，才能监督治理实效。

他认为，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投入产出并不一定成正比。目前包括工业、城市、农业对土壤造成的污染排放还没有得到扼制。“如果还是边治理边污染，效果不理想，大规模投资就有可能成为环保产业的一场投资盛宴或游戏。”

透过生态城看中国城建弊病

法国《欧洲时报》2015年10月2日

天津新港爆炸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而该市与新加坡合作建设的生态城却似乎退到了后台。《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从天津生态城到许多省区半途而废的公共建设烂摊子，剖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大搞房地产项目的弊病。

哈罗德·蒂博撰文指出，在污染严重的渤海湾附近，天津生态城就像是一个海市蜃楼。这里的建筑物有绿树环绕，成了城市森林当中少见的开阔的绿色小区，甚至令人忘记这片区域大半年都淹没在雾霾当中。小区的公共照明使用太阳能板充电，届时还准备使用风能充分展现可持续的特点。

对于天津的领导人来说，与造船和不动产行业大集团、新加坡吉宝企业合作开发生态城，建设这个全球最大环保区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件。然而，天津近段时间出名并不是因为环保工作取得成效，而是因为8月12日距离该地十几公里发生大爆炸，夺去了173人的生命，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员。

2007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介绍了生态城项目，准备接纳二十万居民，相当于法国雷恩市的人口。但主要的问题是，这个生态城目前只吸引了大约三万居民入住。对此，相关负责人断言近日会迎来新的居民。

这里本来是受污染区域，地方化学工作者对土壤进行了治理。空调主要依赖地热，对主要建筑的设计考虑到了减少白天用电量，居民分捡垃圾可以换取超市购物的积分。

生态城研究负责人彭振扬（音译）毫不犹豫地指出，“从计划到运作，我们拥有一个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这个地区百分之二十的能源取自可再生能源，也就是说达到了中国2030年的目标。

巨额成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支持的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提供了新的机遇：2014年推出的建设京津冀大都市计划将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连成一体。从理论上讲，这一区域将集中上亿人口。习近平委托副总理张高丽协调这个新的城市规划方案。张高丽进入中央之前前任天津市委书记，生态城的一位干部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张王牌。”

生态城投入的建设成本巨大。据相关负责人透露，已经花费了八百亿到一千亿元人民币，总费用可能高达二千三百亿元人民币（三百二十亿欧元）。

这座榜样城市让人头痛的是如何吸引居民入住和企业入园。经济活动园区本想引入动画工作室，到现在还空着。小区里开设了一家高质量的诊所和几家自我标榜的好学校，希望能够说服参观者来此生活。张美洁（音译）夫妇决定带着两个孩子来这里安家。她解释“这里幼儿园的质量看起来不错，而且环境绿化很好。”

其实他们决定入住还另有原因。进生态城安家可以享受补贴，实际房价低于市价。因此，由于这个榜样小区位于工厂和码头的尽头，张先生每天早晨开车一小时进入天津市中心上班也就认了。把房价降低到低于市价的水平是生态城吸引居民的主要因素。小区完工之后的几年当中几乎空空荡荡，现在逐渐地有了人气。

曹妃甸的教训

距离这里不到八十公里的曹妃甸经济开发区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这个濒临渤海湾的小区准备发展冶金工业，建设成为接纳一百万居民的生态城。这个项目于2003年推出，2006年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亲临视察，如今却被弃之一隅。由于远离商店和学校，根本没有居民愿意入住，房地产商因此债台高筑。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院副院长李翔宁认为，曹妃甸经济开发区的例子反映了一种“首先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的城市化建设”。“已经有人对此项目提出批评，但是一旦得到政府的批准，便可对批评之声充耳不闻。”

公共建设烂摊子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工作室在全国很有名气，受到准备建设新区的地方政府的热捧。李翔宁发现，许多地方政界负责人找他的工作室，首先是想将他们的项目与一个著名的城市规划工作室挂钩以寻求担保。当他们完成可行性研究之后发现项目无法实施的时候，有关市长往往去找其它学院批准他的项目。“他们以为展示以前的成绩和生产的速度，就可以得到批准。”不过，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反腐运动已经促使国家工作人员较为慎重地使用国库的钱。

天津生态城如果不是因为补贴房价的话，可能成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大赛当中的第N个公共建设烂摊子。生态城研究负责人彭振扬介绍，中国有约六百个自称“生态城”的小区，其实大部分根本不符合严格的标准。城市规划师德康认为，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几乎人人谈论生态城，而实际上仍停留在理论的阶段。

由于“项目过多、经济成本昂贵、仅追求盖上环保标签、缺乏接地气”，这些尝

试都不大行得通。德康指出，同时，鉴于当地的背景、气候、地理或历史，许多并不想环保的房地产项目反倒更可持续，中国建筑师王澍在杭州的工程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正在展开城市化建设的竞赛，需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意思做得更多。现在，中央政府要求防治污染。巴黎第一大学地理学家、汉学家程若望分析说，“地方政府奉行的是发展和窗口的逻辑。他们之所以决定建造楼房，是认为会对当地带来更好的前景。”这场追逐越来越宏大项目的竞赛的起因还在于中共的升官机制。“通过建设来展示政绩，有助于仕途的发展。”

这些疯狂的雄心受到快速城市建设承诺的推动，因为地方官员相信他们所推动的项目早晚会有居民入住。根据中央政府的预测，2014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口占54%，这个比例应当每年增加1%，到2020年达到60%，即有八亿城市人口，环保便成了重大的议题。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今年九月份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201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持平，但是城市却占中国排放温室效应废气总量的58%。

过度建设的逻辑

地方官员因城镇人口增长的前景而受到鼓舞，认为应当做得更大，因为大部分的地方收入来自向房地产商出让地皮。自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展开集体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近三十年，市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赶走占用土地的农民，以低价将他们重新安置，然后把土地长期租用给房地产商，用增值来为地方预算融资。

地方上奉行的是与实际需求脱节的过度建设的逻辑。2014年有三位城市规划和地产资源管理学教授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披露中国城市建设的面积扩大了78.5%，而同期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仅有46%。

澎湃新闻引述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近组织的一次大会透露的信息，每个省都会平均有了4.6个新县，市区人为扩大，楼房象雨后春笋般涌现，绵延几十平方公里，有些甚至达到几百平方公里。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坦承局势“失控”。

距离天津生态城仅二十公里的于家堡金融区的摩天大楼便是这种上层臆想出来的城市化建设的极端表现。天津这个崭新的商务区可能只有在法国巴黎拉德芳斯才能够找到类似的大楼。这些大楼位于海河两岸，园区设计者在河边上做了一个沙滩，给小区增添人性化色彩。海河的一岸辟为金融区，对岸是国际贸易区。横跨两岸的桥上竖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下了理想中国的诸多价值：繁荣、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制、爱国、尊重、友谊。

不过，于家堡的摩天大楼全部空荡荡的，大部分的工地不见工人身影。在2007年招聘建筑设计师时，于家堡曾被介绍为东方新曼哈顿。2007到2012年，天津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6.5%，始终保持在中国领先的位置。超高速增长的能量来自投资不动产项目以及公路、铁路等基建项目。

天津是中国东北部主要港口，并不是象上海或是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中国日报》2011年甚至宣布“于家堡可能会在今后十年当中成为世界上十大金融中心之一。”在当时，似乎没有人提醒说，要成为曼哈顿，起码需要一个具有规模的金融中心。

疏通首都

位于219米高ZOVIE大楼脚下的周华（音译）不动产经纪行正在伺机捕获客户。据说目前仅有不到二十家公司进入这座摩天大楼办公，建筑公司将视小区的发展情况对大楼6层以上进行装修。周华承认由35家开发商承担的45项工程大部分都处于停顿状态，马路对面的双塔一直都没有完工。

也许，杳无人迹的于家堡金融区将会迎来第二次机遇。9月20日，火车从北京南站开出，不到一小时便可以到达这里，一座全新的火车站等待旅客的到来。中国网络巨头腾讯公司似乎跃跃欲试，在其中一座塔内设立办公室。

根据中央政府的决定，目前致力发展京津冀大区。距离北京东部一小时车程的通州区后北营村已经开始动工，令人感受到这个新的城市规划项目的规模。政府计划拆除一些房屋以疏通首都。北京市政府可能会迅速离开拥有2100万居民的首都的中心地带，迁移到这里。

居民们8月份还在谈论未来的变迁。在这个有192家住户的小镇主干道上，可以看到官僚为鼓励居民毫无怨言地接受搬迁而设计出来的宣传标语：“分享拆迁和改革的荣耀，共同建造美好家园。”一位居民更情愿去设想首都卫星城通州将拥有的美好前景。他表示，“如果政府有饭吃，我们就有饭吃。”59岁的建筑工人裴淅湘（音译）是这场高速变迁的见证人之一。他记得80年代这个地方最高的建筑不超过三层楼，他预言五年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还将改变。自九月中旬开始，这个村庄就已经成了瓦砾遍布的工地。

《网络安全法》推进依法治国新举措

俞晓秋 香港《镜报月刊》2015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日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并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咨询，听取社会各方意见。这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贯彻落实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确保国家网络安全的重大举措。它也表明依法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依法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无国界概念渐被有国界取代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一种崭新的信息数据生产、流动传播、交换增值、存储处理，以及形成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更密切互动的平台与应用工具，构成了一个虚拟与现实迭加交融的网络空间。它不仅是网民的个人空间、群体的活动空间，更是一个社会与国家越来越重要的空间，承载着经济、金融、通讯、政治、外交、文化、国防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数据流动和信息系统。互联网与无线通信及信息系统一体化整合构成庞大的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被视为一个新战场和对抗空间出现之后，国家力量势必会加以介入、干预和实施管理。美欧便是实施国家对网络空间管理的先行者，而追随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后发国家从其信息化发展初始，国家就在其中扮演着主导作用。因此，互联网发展之初无国界和开放自由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被互联网是有国界的、网络空间治理和信息主权概念以及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等所取代。

过去十年来全球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已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然而互联网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网络空间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与国家空间。与前互联网时代不同，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几乎把社会活动的各种主体对象以及要素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又把各国的网络空间相互连结在一起，形成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何管理互联网，以及如何治理好网络空间，无论对信息化发达国家还是信息化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现实的重大挑战。从已有的国际经验看，将国家法律延伸到网络空间实施管理，又依据互联网的基本属性和应用特点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开展网络空间治理、保障网络安全、展开国际协商合

作，是当今世界的通行做法和大势所趋。

用法制规范网络空间行为

《网络安全法》（草案）正是在全球互联网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中国网络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和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呼声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个法律草案是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制定的、首部针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的系统性大法。此前大约有十多部涉及互联网的专门法规条例，从事互联网安全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是两个法律文件，即《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和《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以及其它相关行政条例、规章等，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和《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2015年）。

这次公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开宗明义阐述了制订该法的目的，即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确立了保障中国网络安全的指导方针和目标，即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保护能力。草案中的这些表述，是对过去十多年来在互联网治理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实践和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网络安全领域在法制上的一个创新，体现了用法制来进一步切实加强对国家信息安全的保障，规范网络空间行为。

四大新亮点有的放矢

从笔者角度看，这部《网络安全法》草案的新亮点还在于，第一，从法制角度确立了国家网络安全管理体制架构和治理体系，明确了网络安全管理各级各部门的协调、保护与监管权贵，改变了过去在互联网安全管理和治理上的多头管理、各管一摊、九龙治水的局面。草案也明确规定了网络开发运营服务提供商、网络相关行业组织以及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权利、责任与义务。

第二，着力加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贩卖谋利、被滥用的现象比较严重，网上人肉搜索以及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使公民个人隐私和声誉受到肆意侵害。此次公布的法律草案涉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包括第4章第34至39条，第6章第52(2)、54条和第7章第65条（5）等共有9条。这些法律条款明确提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对违法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惩处规定。草案的公布和正式通过将有望基本解决这一顽症痼疾。

第三，把制定网络安全战略和规划，网络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以及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写入了这部法律之中，明确了相关部门应担负的法定责任，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与水平。

第四，为网络安全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正如草案总则第1和第5条中明确写道，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国家积极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依法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之大势所趋。

《网络安全法》制订将推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也会随之得到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法》草案也必会在充分咨询社会意见后更加完善。正如草案说明指出的，该法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基础性法律，主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将近年来一些成熟的好做法作为制度确定下来，为网络安全工作提供切实法律保障。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响应全球“再工业化”推高端制造 香港科技园助香港经济多元发展

陈涛 香港《文汇报》2015年10月14日

创新科技是决定国家及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年，各地政府如中国、德国、美国等，更开始聚焦推动“再工业化”，鼓励将创新科技融入工业，借着推动高端制造，建立新兴工业，既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及发展机会，亦借着制造业带动出口，有助经济多元化发展。香港科技园公司是推动本地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一员，在上一期专题，我们邀请了其行政总裁马锦星分享公司如何借强化增值服务，培育人才，支援科创企业。今期专题，继续请来马锦星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发展把脉。接受访问时，马锦星更分享了早前带领一行二十多名本地工业家，远赴德国观摩当地“工业4.0”的得着。他表示，在德国的所见所闻，让他更确信创新科技是推动再工业化，增加就业，令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锦星接受访问时强调，香港推动“再工业化”，是应对不同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在经济结构方面，现时香港经济发展较为单一，偏

重于金融、服务等行业，有碍经济持续发展。他指出：“香港的经济亦曾经百花齐放一七十年代的香港，制造业起飞，占当时GDP 超过百分之三十，各行各业发展迅速，机会处处。唯自八十年代开始，制造业逐步北移，香港的经济亦开始转移至金融、地产、服务业等，趋向单一。今天，制造业占香港GDP的比例更大幅下跌至少于百分之二。”

推再工业化发展“八爪鱼”多元经济

面对此经济单一的困局，如何是好？马锦星认为，推动“再工业化”，透过创新科技，协助工业升级转型，鼓励高端制造是重要一步。“再工业化”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为了振兴社会经济而推行的国家战略和计划。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德国的“工业4.0”等，都规划了具体措施，鼓励企业发展高端科技和高增值制造业。2015年5月，中国国务院亦推出《中国制造2025》，配合“互联网+”等策略，部署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马锦星指出，香港具备优厚的条件发展创新科技，推动本土工业复兴。他说：“我们拥有多项独特优势：世界级的科研人才、基建；资讯、资金自由流通；发展成熟的物联网、金融领域等科创技术；毗邻市场庞大的中国内地等。香港的科创生态圈在亚洲地区中首屈一指，年轻人的创意及科研实力均很强。”

马锦星相信，创新科技可为本地工业注入新动力，开拓新兴产业，同时制造大量就业机会，强化本港的工、商、金融及服务业等，达至经济多元化发展。“只要我们连结各界、发挥优势，透过高端制造业，可以为香港发展‘八爪鱼’式的多元经济，由不同产业来共同支撑，灵活应付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再工业化’正可以为香港带来出路，令本港经济转型。”马锦星道。

装备业界率工业家往德国考察

为推动香港“再工业化”，协助业界加深了解，马锦星早前更亲自率领一行二十多名本地工业家，前往德国考察，观摩当地“工业4.0”的发展，了解德国如何透过官、产、学、研各方合作，将先进的机械人、物联网等技术，融入高端制造，实现生产线自动化及个人化，做到从产品材料、制造、包装、物流到推出市场的无缝连接。

马锦星表示：“德国是发展先进工业的佼佼者，在金融风暴中，德国也因着其强大的工业实力及出口增长，使其社会经济于短时间内快速复苏。是次考察，让我更确信我们走对了方向—以创新科技推动高端制造，创造新兴产业，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并借此带动出口，增强竞争力。”

创造空间活化工业邨

再工业化的进程，背后需要强大的创新科技研发、工业、产品设计及制造生产的支援，而由香港科技园公司规划发展的科学园、创新中心及三个工业邨，正正为整条产业链提供一条龙式的增值服务及支援，协助业界作好准备，迎接“工业4.0”时代。然而，推动任何产业发展，土地运用也是非常重要。香港寸金尺土，土地资源珍贵之极。面对这个挑战，公司有何良策？

对此，马锦星提出了土地（Land）及空间（Space）的概念。他说：“虽然土地有限，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创新思维，在原有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空间，支援研发及进行高端制造。”以科学园为例，为了支援业界在研发上与日俱增的需求，公司已积极探讨不同方案，于现有土地内，创造更多科研空间。

此外，他们亦着力推动活化工业邨，正在与政府商讨具体落实方案，期望透过修订进驻条件，以优先吸纳对本港经济持续增长至为重要的创新及科技产业。马锦星补充，现时三个工业邨已汇聚了不同类型的产业进驻，如生物医药、多媒体产业及数据中心等。为了支援香港的再工业化，公司亦积极探讨发展“第二代工业邨”（Industrial Estate 2.0），以兴建多层工业大楼为主，创造更多空间，让更多新兴高端产业在港科研、设计及制造。

转化大学科研培育“香港制造”产品服务

开发崭新科技是推动再工业化的重要一环，机械人、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是核心所在。在这方面，马锦星认为在大学进行的科研项目是社会宝贵的资产。因此，培育人才、促进业界及学术界之联系，将大学科研带出实验室，转化为裨益大众的产品服务，推出市场，也是香港科技园公司其中一项重要使命。谈及科学园的成功故事，马锦星如数家珍：“创立生物医疗公司Novoheart的香港大学教授，以干细胞复制人类心脏，为药物测试带来革命性改变，现正在科学园内深化研发，期望将技术带到市场，造福病人。毕业于我们培育计划的水中银公司，将来自城市大学的基因鱼验毒技术，透过科学园的平台发扬光大；另一间培育公司Rehab-Robotics，将来自理工大学的技术化身为‘希望之手’，专为中风病人进行复康训练而设。”

马锦星对本港科研人才充满信心。他强调，未来香港科技园公司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实践“3C”精神，联系（Connect）社会上各持份者，推动科创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商界之间的协作（Collaborate），促进（Catalyse）创新科技的应用，借此推动香港“再工业化”，为未来带来无限发展生机。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谈起

北京时间10月5日下午17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来自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奖，以表彰她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本栏目就屠呦呦获奖的意义、影响和启示等方面，摘选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供领导参考。

中国科研实力的综合体现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一个中国本土教育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扫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不能创造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魔咒，而这次屠呦呦的获奖证明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及中国的科研体系是有能力创造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的，应该说是中国科研实力的综合体现。（央广网 2015年10月6日）

拷问中国院士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刃韧**：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即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也没有院士头衔。其实，上世纪50或60年代在中国大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博士学位及留洋背景是正常现象。然而，此前默默无闻的屠呦呦在2011年获得素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美誉的拉斯克奖（Lasker Award）之后仍没有当选院士，确实引发了不少议论。这次，屠呦呦又获得诺贝尔奖，无疑又是对中国院士制度的一种讥讽。中国的院士制度需要彻底改革，应参考发达国家的会员制，从目前的利益制度转变为荣誉制度，去除等级地位和特权利益。（《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10月15日）

对持之以恒的科技人员是极大鼓励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和中国南京大学“千人计划”教授**宋晓东**：屠教授和团队当年从中医中药中的发现非常聪明和了不起，认可来得较迟，希望有更多国内杰出的工作得到国内、国际的认可。这一次的获奖对广大的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工作的科技人员是极大鼓励，也能鼓励中国思考和探讨科技创新和评价体系。（侨报网 2015年10月5日）

带给中国两点启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一是中医药是中国最有原创优势的科技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产生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是很有希望的，值得我们深入挖掘。这次获诺奖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增强了对中医药的自信。目前，人类还面临许多棘手的医学难题，如心血管疾病、肿瘤、

代谢疾病等，都是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而中医药的复方很有可能在防治方面有效突破。二是什么样的成就能得到诺奖？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只要踏踏实实地从人们最需要的健康、环境、经济等问题入手，坚持不懈努力，取得重大成就和突破，诺奖就离我们不远。（新浪网 2015 年 10 月 6 日）

创新当有明确的目标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从屠呦呦的科研经历中可以发现，创新应当有明确的目标，并非个人的单打独斗。创新发明不仅仅是在杂志上发文章，也不是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他们当年目标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找到能够有效治疗疟疾病的药，然后大家群策群力、集体协作，尽管屠呦呦今天代表团队领奖，但是这个奖应该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默默无闻奉献的那一代人。（中国广播网 2015 年 10 月 6 日）

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钮文异**：作为咱们国家土生土长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是第一个，这证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她获奖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只要坚持自己的科研信念，认真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关注世间的纷杂和名利的得失，我们也能取得令人自豪的成果。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不要以为我们不如别人，国内的团队同样能取得一流的科学成就，她确实树立了好榜样。（中国广播网 2015 年 10 月 6 日）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